

GD 5-1-5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0652

专 题

“吴佩孚工作”档案资料

丁小强 译
吴根梁

陈劭平 校

中 华 书 局

1987年7月

译者说明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根据日本政府对华新方针，对当时退隐在北京的吴佩孚展开活动，促其出山，“收拾时局”，成立伪中央政府。土肥原机关周密制定的“吴佩孚工作计划”，由土肥原贤二亲自主持，大迫通贞少将直接负责，日本驻华使馆、领事馆积极配合实施，并在北京设立专门机关，派吴佩孚在洛阳时期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来北京，担任“敦请专使”。因此，“吴佩孚工作”，曾喧闹一时。但由于汪精卫投日，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日本方面又将争取吴佩孚工作改为促成“汪吴合作”；日、吴、汪三方之间互相进行了频繁联系。但终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使日、吴之间、汪、吴之间达成妥协；吴因为未能满足其条件，没有出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吴佩孚突染牙疾而死。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也宣告结束。

土肥原机关在开展“吴佩孚工作”时，留下了大批档案资料，我们选择翻译了其中一部分，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 一、囑内转呈冈野增次郎报告
 - 二、吴氏思想表现一束
 - 三、昭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吴佩孚、大迫少将会见记录
 - 四、吴、冈野之谈话
 - 五、什锦花园 吴佩孚轶事拾零
 - 六、吴佩孚与日本之意图比较
- 附录：和平救国会宣言
- 关于收拾时局汪精卫、吴佩孚间往复文书之件
- 陈中孚、汪精卫会谈纪要

“吴佩孚工作”资料目录

堀内转呈冈野增次郎报告·····	(1)
怂恿吴氏从汉口出动·····	(2)
关于吴佩孚的想法之谏言·····	(4)
与前参谋总长蒋雁行谈时局·····	(5)
吴佩孚谈中国之共产主义·····	(7)
吴氏思想表现一束·····	(8)
昭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吴佩孚、大迫少将会见记录·····	(12)
吴、冈野之谈话·····	(14)
什锦花园吴佩孚轶事拾零·····	(16)
吴佩孚想法与日本意图之比较·····	(20)
吴佩孚究竟该出山否·····	(20)
吴佩孚想法与日本意图之比较·····	(20)
附录·····	(24)
陈中孚、汪精卫会谈纪要·····	(24)
“和平救国会”宣言·····	(26)
汪兆铭来函·····	(28)
复汪兆铭·····	(29)
吴佩孚致汪精卫函·····	(31)
汪精卫致吴佩孚书·····	(31)
吴佩孚复汪精卫书·····	(32)
孔祥熙、吴佩孚来往信函·····	(34)

堀内转呈冈野增次郎报告

呈上 有田八郎^①阁下：昭和十四年八月十日^②

驻中华民国（北京）大使馆参事官

堀内干城

关于吴佩孚情报报告件

现将与吴佩孚有特殊关系的，原吴的顾问冈野增次郎递交的关于与吴会谈的报告（见附文）呈上，仅作参考。另写报告再进一步说明。自冈君初抵北京，与吴接触时，便经常注意不使其过分骄傲自大，但由于原为吴氏之顾问的关系，未能充分达到此目的。此点望乞见谅。

七月十三日下午七时半前后，访吴氏于什锦花园。乘主人晚餐后在院内消遣纳凉之时，余向吴氏提出了两个题目：

一、读汪精卫声明有感。

二、秋月左都夫氏之中日亲善观。

吴氏看了以上两个题目，颇现喜悦之色，说道：“汪先生此项声明太长，吾恐言多不仅不得一般中国人士谅解，且于收拾时局上亦成为相当之障碍，中国□□者贵于行而不贵于言。予不想在尚未出山之前发表过多声明。”

冈：“近日闻阁下获李、白二人之消息，确乎？”

吴：“武汉为中国之枢纽。汪先生在西南之时和西南派领袖李宗仁、白崇禧所谈之情形，余处亦俱得报告。当时汪氏向李、白二人详述了反战主和之宗旨，当谈及应携手共事时，遭到了李、白的拒绝。他们说：‘诚如阁下所言，与日交涉，中国不失主权，而日中冲突得以顺利解决，则此乃吾辈之素愿，甘愿听从，但倘若汪氏所为与“临时”、“维新”两政府相类，则实不敢从，命’。此为李、白二人严厉拒绝汪氏劝诱之佐证。故根据现状判断可知汪先生

①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当时任日本外相。

②按：昭和十四年为一九三九年，以下类推。

对西南诸将之号召力极为微弱。”

冈：“阁下安居府中而尽知天下之事，令人不胜钦佩。”

吴：“可以说秋月翁之所论，正确地估价了时局。中国不丧失主权，则于日中互惠条约始可称日中亲善和平。”

冈：“秋月先生乃余平生视为尊老敬贤目标之第一人。他曾担任过驻奥地利大使，今兹八十二，精神矍铄过于壮年之人。汉学之造诣颇深而又更擅长法语。平生极推重阁下之为人。闻大迫先生于本月十八日前后再次抵京，欲继续与阁下之交涉。”

吴：“报上传闻汪先生将起来收拾时局，如此极好。余深深期望其能成功。若见汪氏等到底未能收拾时局，是时，余再出山又何尝不可？”

怂恿吴氏从汉口出动

（七月十五日下午七时）

冈①：据近日所闻，“临时”、“维新”两政府颇有拥戴汪先生之意向，将欲组织统一新政府，并以武汉为其政府之所在地。

窃以为武汉之地乃中原之重镇，且靠近西南及四川，对联络四川及广西将领有特殊便利之处。而与西南诸将协力以谋全面之活动，极为重要。在收拾时局方面，武汉实为必须予以特别重视之地方。

张②：昔太平天国之乱，湖北巡抚胡林翼据守武汉，致使太平天国倾覆。故由此可知武汉之形势对东南半壁当有重要之影响也。但如今汪先生据武汉之地，且又得到西南诸将同情，进而沟通联络，则有收拾时局之效果。否则，武汉之地亦将失去其左右时局之作用点。此际在北京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南京有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驻扎，故在此设立根据地□□□□□，与日军交涉，新建统一政府，最为相宜一点，不得不乞请吴将军予以考虑。

吴：武汉实乃中国之枢纽也。汪先生在西南之日，与李宗仁、白崇禧所谈之

①冈野增次郎。

②张燕卿，吴佩孚亲信。

情形，予已得到情报。汪先生向二位申述了反战主和之主张，遭到李、白之拒绝。曰：“诚然，如好好与日本交涉，不丧失中国之主权，而日中战争得以结束，此乃吾等素来所企望者，岂有不从之理。倘若与“临时”、“维新”两政府相类而相近，则实不敢从命，唯有决心抵抗到底耳，云云。

由此看来，汪先生对西南诸将之号召力似亦微弱也。

冈：日前陈中孚君离京南下，临别时留言略谓：目前在河南省有妙道会领袖张星辰手下训练中之武装民众二万人，如能以此作为将来吴将军之亲卫军，集结于武汉，岂不妙哉。

吴：余果出山，则可让四川将领中杨森（号子惠）及邓锡侯所部于武汉集结。在河南省准备中之武装民众作为余之卫队及借为各地区防军可也。但要成为正规军队则非再用一年多时间加以训练不可；况且即使营长以下之主官可由民众领袖充任，营长之上也必须任用经过正式训练之将校。为防止士兵离心，可由其他军官担任副职，使其担当训练指挥之责。不过因其为副职，故待遇以高级主官月薪之三分之二为妥，而以前副职之待遇则只有主官的二分之一耳。

营长以上之将校必须以正式军官充任，以便统率指挥。其总首领张星辰则居上位以号召指挥，但必须以通晓军事之干材辅佐之。

张：河南之武装民众团体成绩甚佳，其志皆倾向于吴帅，系由良民子弟组成，故可依赖。但其原系无秩序之青年团体，非加以充分训练，不能使其军队化。诚如吴将军刚才所表示者，河南民众之总首领张星辰亦有同样考虑。

吴：汪先生担当起收拾时局之任，乃余之所望也。余切望先生之事业成功。于汪氏终究未能收拾起时局之际，余始出山亦无不可。时机成熟则全力以赴，愿为日中两国而尽力也。愿同致力于此。阁下宜从长计议，而不宜操之过急。此举实乃为了日中两国也。但倘非使之似专为中国之利益而行，则中国人民不拥护，中国人民不拥护，则将一事无成矣。此乃余之费心之处也。

据最近（七月十一日上海发）由在上海的颜惠庆秘书张书□寄给余之心腹吴履观之函：此次汪兆铭氏有在日本谅解之下起而承担大局之意，托人劝说颜惠庆帮忙，颜氏未予应承，并借故赴香港。临行前留言于张秘书，略谓：若今后汪氏代表到京，吴氏答应出庐合作，则自己亦愿附骥尾，为天下民生不辞担当

起外交方面之事务。

关于改变吴佩孚想法之谏言

（昭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①）

卢沟桥事变后，经过几次大战，欲从日本战果中一举恢复失去之所有主权，决非易事也。盖北京地处燕赵之要，以铁道紧接天津与大沽。故日军据此地以为后方之策应地也。

方面军司令官驻扎于此，苦于无计巩固后方，不得不一并管辖铁路、邮电、船舶之交通及地方行政、自治行政。抗战尚未停止，和议亦无端倪。于是时按照战时国际法制约民事，盖吴将军之空想耳。若此，要日本退居客位决非若所谈之易也。

近日又闻于外蒙日俄发生冲突。若其发展为正规战争，则作为后方策应地，北京之地位必更为重要矣。故当假以时日，光复被占领之故地旧物。

日中交涉，亦有顺序。若引渡书类之授受问题等，绝非首先争执之问题也。若以册籍作为国权之寄托，似不免失之为错误，况今作战之处正受蹂躏，景物（事态之发展与世人之情绪）俱已非常矣。□□□□一张空文岂有何等国权相附诸乎？

吴将军人格伟大，浩气贯苍穹，德备而道全，举世皆钦佩，友邦亦极敬服。故虽无所求，彼亦将自至矣。

四川军之旧部下竭诚拥戴将军之情，虽迢迢万里而不能阻隔。国民党政府西迁以来，抗日之重点集中于西南，四川成为战时之首都。天府之雄，物产之丰，冠乎全中国；而军旅之盛尤在云南、广西等之上。于目前抗战之形势下，四川军配备于湖北、安徽、江西、湖南者，计达二十余万，先后征集起来送往前线补充，各师旅之壮丁总数，计达一百余万，加之留守四川省境者及曾受训练之民众，合计可达二百万也。以如此雄厚之大众力量，相峙于云南、广西之间，蒋介石可以延长战局矣。

①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

因而，吴将军之执导和平者，乃为四亿同胞立刻变憔悴为欢乐，化干戈为玉帛也。故宜令友邦日本予以特别之重视。诚能先使四川之同胞联袂相接，一旦使群雄宾服，号令之下，立换雍蜀（四川之旧名）之民族旗帜，于日中之戎马声中还我河山，成为中原主人，则国家栋梁之材不召自来，此乃吴将军速立政权之基础，重整中华民国之第一步也。（冈野增次郎）。

与前参谋总长蒋雁行谈时局

（昭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①）

此日上午十一时，如约拜访前参谋总长蒋雁行（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于半壁胡同蒋氏私邸。相见有如旧识，真不愧为吴氏以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身份于武汉再起之时，接任蒋方震之参谋长，威风凛凛。其宅邸亦甚堂皇。蒋氏已退伍，现年约六十五岁，为一好老翁。来意叙过，所谈颇感爽快。

冈：久闻大名。此次前来奉侍吴将军，必欲令小生与阁下相见，故马上特意来访，鄙意欲为永久性之日中亲善而努力，不知总长肯赐教否？

蒋：相见甚迟，十分遗憾。此次先生来燕②，余极解先生之意。彼此不在其位，欲谋其事，多叹实行之难；唯从容研究，以资达成。乞请一世之长者吴将军出庐，收拾大局即可也。

冈：昨日，见了刚经上海、青岛来燕之坂西中将，并交换了几乎同样的意见。尚不知总长又会见了中将，彼此交换了意见，如能闻其大略，则幸甚。

蒋：与坂西中将相见有三次，约略得知了汪兆铭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据云：汪正在南京网罗旧国民党之中坚分子，欲组织中央政府。同时尽力于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之劝导工作。不日，新政府组织方案将完成，欲拥戴吴氏为新政府之最高军事长官，将派代表至北京。

总之，汪氏欲拉国民党改组派，于南京建立政府，与蒋介石进行一党治国制下的本家之争。据此于南京召集国民大会，以定大局，此举非为不可。但如

①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②燕，北京。

无民意响应之，则必不能成。况且今天治安之关键于日本军掌握之中，于人民则无信，于政府则无威望，因而作为一国之砥柱以推行大事，实为不可也。如是，则欲作为招牌将吴氏拉出来。

冈：阁下高见，深为佩服。汪氏收拾时局之打算，想来总不会越出总长视野之外也。未知拥戴吴氏之经过及将来之对策当从何出，愿闻教以定其大策。

蒋：众人一致认为汪氏之工作皆赖拥立吴氏成功，方能收拾时局。余相信千里迢迢渡海而来的阁下之意当亦如此。故予如今将一己之见和盘托出。说到吴氏之心胸，吴氏平生会见他人，于多数场合决不吐露真情，而以胡说八道如英语所谓“camouflage”之态度出现，使对方无法轻易窥测自己心境。但仅与余二人打开窗户说亮话之时，则充分体现彼之本来面目，乃知礼让、善妥协，且诚实而刚毅也。现在日本军司令官及下属日方要人皆担心吴氏将握有全权，而其必立即要求日本撤退，然吴氏之主张与此全然相异。彼对于现地形势有颇为深刻之认识，于此可充分看出彼之聪明也。彼不仅不要求撤退，且彼出山后必当担任之治安工作，若必要则尚望皇军驻屯，只是彼设立所属之必要机关时，以绝对不受日方干涉为其信条。因此，彼全然无意于皇军司令部及部队之异动。要其全部仍按现状驻扎，所有事情由吴氏方面尽力谦让，将其作为客人（客军）应酬之。于必要之情况下，将就具体事件继续进行交涉，以求取得圆满的和平报国之实也。此乃彼胸中隐藏之第一希望。即与友邦交往尽量礼让，于自己行动则加以节制。此为彼之真面目。此点恐系日本方面几乎全未理解之要点也。

冈：诚如阁下所判断者。今日得访总长，所承教益与余平生所信奉者全然相符。对吴氏之心境，若明镜高悬，清晰可辨。吴氏乃礼义之士，朴实之模范也。弟平生对吴氏寄以极大之敬意者，盖在于此耳。

蒋：夫唯吴氏意志坚定，不易被他人佞言所惑。而汪氏则恰与吴氏相反，其心术之流动性若油一般。有嘴巴善喋之人，拉住指头善描之客^①，要使如石之吴氏与如油之汪氏一起合作，则即使将二者置于一个桶中搅拌之，亦断难使其

^①原文如此，疑有所指，未详。——译者注。

同化。从南北两方思想界之反映可见，人们以硬石为可靠者，而不信汪氏反复无常之心。吾人当检讨其各自之长处与缺点，以促使合作之形成，共同为今后持续百年之日中亲善工作而挺身而出。为探讨与实行之，当抛弃多余之客气，保持思想之交流。日后到阁下之寓所回访，必有更多之话题也。

谈话渐洽，约定再会面。告辞。西谚云：战争乃错觉与误会之继续焉。呜呼！其无充分疏通日中两国思想之良法欤？暂且记之可为后日之鉴戒。

吴佩孚谈中国之共产主义

七月十八日 什锦花园漫谈

七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半驱车至吴宅，漫谈移时，大至经过如下：

冈：回顾牧野伯爵有语云：慧眼观时机，以行天下事。

吴：决不丧失时机，若说即日行，则必于即日已作好相应之准备矣。唯牧野伯爵之所言尤为高明耳。明治维新时，日本犹存孔孟道德之基本，故为事便利。如今于西洋科学闯入之同时，亦带来恶化之西洋思想，此点中国亦有同样之忧患，深感于是时把握人心归一，树立治国平天下之计非为易事。仅老人之所见，日中之情况略同。

冈：近卫公爵于最近发表了对华第二次声明，谈到了世界之动向，值得稍加倾听，抄译以供参考。

吴：近卫公爵之第二次声明，于大体上余亦欣然赞同。此中插入余之若干私见尤感荣幸。以余之所见，共产主义于中国根本不可能实行，何也？因中国历代之明君贤相素常采用不忧不富、唯恐不均之政策。历代之为政者有形无形地实行均产制度，且不使官吏涉足商事，以免与民争利之弊。一心留意于使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况今日机械工业尚未发达，不允许大资本家之存在，大地主亦不复存在，则共产之学说显然不能在中国流行矣。

而作为防止赤化之方策，必得提倡我等固有之东方文化，如是即足矣。换言之，以礼教为防楮，重五伦，崇礼教，发挥克己复礼之精神，限制私欲之发展即足矣。从而使阶级之界线于无形中泯灭。尔后必须修明政治，增加生产以安定民生。如此，则中国之共产党必自然而然彻底崩溃也。

而后当行荡荡之王道。虽有各种各样牵强附会之说，但贵国所提倡之皇道，与中国固有之王道差别甚小而实极相似。日中循行此道，则必当振兴东方文化，实现东洋和平也。应反复强调者：日中之国交必须努力引导，使之自然而然地进入正规。余信守欲速则不达之格言。操之过急则于事无补。只要能达到最后目的，足矣。此亦恰如余之出山问题，不可焦急，不久，水到渠成之时将至也。

冈：洛阳时代，你屡言欲以武力荡平中原，于此处实行模范之政治，以使天下归心。而最近则有直接实行礼治与文治，学习圣人治化之说，此抑亦心境变化之故乎？

吴：然也。彼洛阳时代学问未成，道德涵养亦差，故往往不自量力。而今之学问道德已入圆熟之境，欲以平治而定归趋，奉神意而导黔首，实乃殷鉴之昭昭也。余痛感惟有道德，惟有道德莅临于中国，惟有依靠道德之力量，此外别无他法矣。

谈至此，吴氏将正着手编著之有关日食、月食天文现象之书籍原稿展示，略略作了说明。随后又展示了对近年中国要人中作古者盖棺后的人物短评。

“促使余觉悟者，乃与余赤诚相待的曹锟、黎元洪、孙岳、蒋方震、徐绍祯、韩复榘、郑孝胥、徐世昌等的这些评论也。”其说大抵中肯。以上盖由扶乩而得，署道名“太和”，是亦可称为“生死簿代笔”、试以三分、四分、五分、六分等评价以展现人物之价值。

吴氏思想表现一束

一、五月三十日，会见吴氏对冈野表示之思想。

因余目下为在野之身，故汝作为今后于日中两国之间担负调节重任之身份，仍以昔者原巡回使顾问相称，为帮助中国人民而滞留于燕京。和余之会见，每天早晨或下午三时后皆望光临。

即使象世间所传那样，余出山，亦并不曾主张日本兵立即撤兵。余相信东亚和平乃第一要义，故余希望阁下在此意义上作为自己之心腹，为中日两国而

努力。

于此番各次大事变中，各处皆出现意见对立，毋宁说是自然的。正如市井所传的“下克上”之行为，亦渐解消，改为“上容下”之立场，一切均会顺利。希望尽快引导走上平和之路。

二、六月三日会见。

吴：吾人最后决心已定。不日待大迫少将归燕之时，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中两国彻底之和平解决，必须予以妥当处理。届时请阁下务必尽力周旋。余事且暂置之，而尤以主权问题为关键。无论如何，天下大事必缓而图之，然而亦不可不顾也。必须一步一步地交涉，以得出最后之结果。乞阁下予以周到之准备与考虑。

三、六月七日会见

余经与阁下等之周旋，相信时机成熟时，与贵国政府代表杉山^①司令官面晤，以讨论一切大事，可也。余今仍为在野之身，故不能与贵国政府相约何等条件。而以私人密约形式，则不仅将来不能向中外公布，且公布之亦不易为国民所承认，因此不能履行之。然则失信于友邦也。

又所谓着手行政、教育及编练军队等，亦当先担任治安之职，方可将中日两国之国交纳入正轨。而此则需若干岁月亦未可知。所谓要求日本军撤退，为时尚早也。万事当有待今后之交涉，非进行充分磋商不可。

但迄今为止，日本访问者于此点（当指要求日军撤退——译者注），则过于担忧。对余之言论未能全面理解而加以传扬。故希将此点正确地向日本方面予以传达。迄今彼等工作终未成功，皆因未理解余之意思故也。

今阁下询问余收拾时局之策，余欲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即因事所异而想方设法，譬如蜘蛛欲吐丝作网者。作网之蜘蛛腹中充满了丝之原料，但先剖腹以观其结网之原料则不可，如是则蜘蛛必死无疑，弗能吐其丝作其网也云云。

四、六月十四日会见

今中国之人心混沌不轨，特别是青年阶层之赤化思想相当深刻。故尔，即

^①当时日本驻华北司令官

使从地下唤起当年平定长毛之曾文正公，要纠正此种思想，至少亦需要施以二十年教育。况处于今日之国际形势，亦不能全然效仿曾国藩先生。

五、六月十八日与大迫将军会见谈话。

大迫将军略略述说了与汪精卫之接洽经过。说道：“吴将军与汪氏之合作，亦当与上回同唐绍仪交换意见那样，彼此礼让而进行之为最好。”对此，吴氏答道：“今后，余与汪先生之合作，亦当彼此礼让而行。对此可不必操心”。

六、六月二十四日

吴氏就汪兆铭来访，希望在顾维钧宅会面这一要求，对冈野作了如下表示：

汪氏来京，余极为欢迎。乞来敝舍一晤最为妥当。余外出相会则为不便，若为警卫上之必要，对外可称系杉山司令官或山下参谋长来访，则采取任何警戒手段亦无妨碍。且余之心境乃仰无羞于天，俯无忤于地，无忤何惧。我不杀人，他不杀我也。且按中国之礼仪作法，亦应为“行客拜坐客”，即在平等地位上之主客访谒礼仪云云。

七、七月五日

冈野问：吴将军与日方交往可谓久矣，而至今尚未达成彼此间之充分谅解，久居庐，迟迟不动，未知何故者也。对此吴氏有如下表示：

日本以专断而强迫中国则不行。如日本不停止战争，仍如是行动，则惟有听任之矣。但若要让余出庐收拾时局，则须树立余工作所必需之尊严。大迫先生为余之出庐尽了力，心中感激。然中国之事不能不触及东洋文化之精髓，不能用德意志式之西洋尺度衡量也。

余愿日中两国建立亲善之国交，自觉负有此等大使命也。日中国交一日不见恢复，余之寿命必当延长一日，然余之寿命皆系于日中亲善之成否，故亦愿阁下于此点有所觉悟云云。

八、七月十三日

七月十三日晚，于吴宅庭园内纳凉谈话，内容如下：

如最近报纸所传，让汪先生担当起收拾时局之任，如是极好。余深望其能成功。夫若汪氏经试行而终归不能收拾时局，于此际余始出庐，又有何不可乎

云云。

九、七月十五日

对吴氏提起向汉口出动之问题时，吴氏最后有以下表示：

于汪氏在收拾时局中终于产生烦恼之时，余始能出山，为日中两国而努力。希志向相同之阁下，亦耐心帮助，而不能着急。此举实乃为日中两国也。但倘非使之似专为中国之利益而行，则中国大众不拥护，中国大众不拥护，则将一事无成，结果是对不起日本云云。

十、七月十八日

冈野认为：天下之大事不能不抓住稍纵即逝之时机，迅捷而行。对此，吴氏表示了如下之意思：

余之于时机未敢有所遗漏，若说即日行，则必于即日已作好相应之准备矣。惟于今日西洋科学侵入之同时，亦带来恶化之西洋思想，若于是时把握国内人心之归一，树立治国平天下之大计，于余亦有相当之苦衷也。洛阳时代余之学问未成，道德自治之涵养尚不充分，故于事不自量力也。

然今已入圆熟之境，故欲以文明之治，定天下之归趋，奉神明之意，普渡天下之苍生也。予痛感惟有道德，惟有使道德遍临中国，惟靠道德教化，此外别无他法。

十一、七月二十六日

鉴于汪兆铭之代表不日将北上，余劝其电招旧友颜惠卿共谋日中之和平。对此劝告，吴氏有如下表示：

日本有日本之立场，中国有中国之立场，任何人若无立场则将一事无成。闻日本政府（不知是否指五省会议）欲使汪氏担任收拾时局之任，故汪氏当有自己之立场也。然现地之将帅恐未必同意耳。若果然如此，假令电招颜氏，又岂非徒劳乎？故尔，只能暂时静观时机，此外别无他法。

十二、七月二十九日

“现今世界瞩目人物，德意志之‘希特勒’与意大利之‘墨索里尼’。为天下民生，以拨乱反正之意气，崇尚快刀斩乱麻之果断行动。吴氏亦于此际以最高军事长官之身份，立刻与汪氏合作，可济中国四亿之苍生”。对此类比，吴氏表示：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霸业，余于洛阳时代曾尝试过，而此后内省涵养之结果，于今不再念及武力矣。毋宁对彼等武力万能主义者当有何种前途稍怀有危惧之念。关于与汪氏合作之事，若一致于今后实行王道平明之政治，则当一步一步接近，为使达到目的而努力。

十三、八月四日于根本少将送别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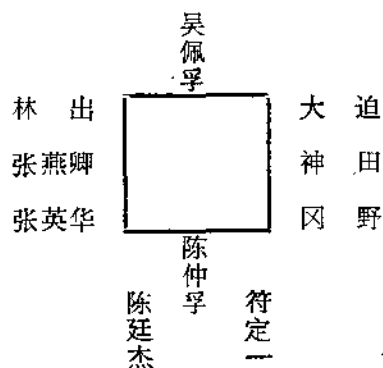
根本博少将曰：幼时吾父启示之：当立志成为医生、僧侣、军人三者之一。不意竟成为军人，虽升至少将，鉴于中日间今日之现状，余于富贵功名之最初念头已消。无何欲求者，盖惟有一心致力于为日中两国之和平搭桥引线也。事成之后，当首先请吴将军渡桥，同时为迎将军而建房备椅，余愿将军能于此一坐，并饮粗茶一杯。对此谈话，吴氏莞尔一笑，答道：

非常感谢。邻人待我以礼，我受之亦当以礼。根本少将已以日中亲善之工作作为一生最大愿望，至诚之心青天可鉴，故此事必有达成之日也。于斯时少将幼时所受之庭训，父君所示之三个志向皆当达到矣。因为阁下已成为军人，目下担负之任务又如治国之医生也，达到此二者之际，当成为所谓“念珠百八通三界，赤足一双遍五洲”，周游天下之大和尚。此岂非人生之一乐趣欤？

就中日国交之调处而言，日本已有如根本少将之礼义之士尽力于此，而有关中国方面，余虽努力有限，但愿作为同道，担负起一切责任云云。

昭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吴佩孚、大迫①少将会见记录

座席如下：



大迫：辞别阁下已经两个月，由于东京方面的工作，敝国内阁诸公及有关人士对情况亦有充分了解，结果一致决定请吴将军出山以收拾时局。同时汪先生亦出来与吴将军一致合作，投身于和平工作。这对于纠正日中两国之国交，并解决日中战争，乃值得庆贺之事，此点乞吴将军谅解之。

吴：据阁下之所言，余对贵国朝野上下之好意实在感激。共谋和平乃余所希望者，且与汪先生合作以解决中日之纠纷，收拾时局，更乃余所最赞同者也。

大迫：此际乞请吴将军指派代表数名，开展预备工作以资进行交涉，因将军为在野之身，故有此必要。

吴：余现乃在野之身，弗能行使命令，故未便指派代表进行交涉，尚乞鉴谅。若临时、维新两政府先将接办之名册造好送来，余接收后方能产生权力。得令彼等专听余之命令，即使彼等与余所指派之负责人员担负交涉之任，从事工作。

“余出山后，为中国之元首，故当与贵国之天皇处于平等地位；余任命之国务总理，当与贵国之内阁总理处于平等地位；余任命之各部总长，当与贵国之各省大臣处于平等地位。如是方能进行正式之交涉也。（以上话语终了之同时，吴氏显示出不居元首地位，不出山之执拗态度。）”②

大迫：吴将军所言诚然不错，但余希望者即于此正式交涉前，由将军指派数人以便周旋商酌，使“临时”、“维新”两政府造送名册，以作为进行接收之方法也。

吴：如是则于此列席之诸位皆可担当之，故若有必要，则不妨由大迫少将指名。余所言者，即便接收“临时”、“维新”两政府，现有人员及日方人员暂时亦当一律任用。余之部下，亦增加人员。“在将来余出山之际，任用人员超过现在十倍以上亦未可知也。”③

①大迫通贞少将，“吴佩孚工作”的直接负责人

②此处原有边注：“翌日吴氏方面要求将会见记录中“ ”部分删去”

——译者注

③此处原有边注：“ ”内删去。

——译者注

冈野：看来大迫将军之意思，于吴将军尚有未充分理解之处。余当于二、三日内将此会谈情况记录整理，进行详细说明。

吴：冈野先生此言极是，望为余详细说明之。

本次会谈以后，冈野将吴方之记录与自己所记者彼此校对，整理成为本记录。

另外，因就指派代表一事，在吴、大迫间有误解。冈野体会大迫的意思，而对吴氏适当地说明道：所谓代表，非指在正式政府成立后，而是在交涉过程中，首先从吴之部下指定之意。又，“一切均委托阁下”是须在正式政府成立后，其前途可大体预见的情况下之意。

冈野极秘密地对原田谈了他对会谈的印象。据他认为，大迫少将的意思，不按照自己所了解的东京的方针——作为收拾时局的策略，采用吴三汪七的方法，而是以吴七汪三之心情应对之，其结果即形成以上之会谈矣。而将吴氏之当元首的心理状态降至三（即将吴七汪三变为吴三汪七——译者注），于今后决非易事也。

吴、冈野之谈话

七月五日

七月五日，呈上一篇文章苦劝之，对此吴氏之答辩意气轩昂，致使列座之中国人为之目瞪口呆。从来由彼接见之日本人皆认为其气焰不可当，谅亦不无道理。然而其内心真率可敬也。

冈：弟此次亲以老躯入京，主要目的是将日本朝野之意图转告吾兄。即使不以前者为难事，而后者实为非常之难事也。未知吾兄于目前收拾时局，有何见解？乞开诚布告之。

吴：予读史而知之：昔吴桀纣之国者，乃耽于豪奢淫侈，上下成风，而违乱天地自然之大道者也。而今见北京城内，日本菜馆繁昌，娼楼妓窟盛行，而日中人等满街争风，形势如斯，予难以置信国家可兴隆也。

冈：此说乃吾兄之旧论也。阁下于洛阳时代屡言：如北京等旧都市，诸种享乐机关俱全，乃腐蚀政治之魔窟。故我据洛阳以示肃清天下之模范，欲行清明